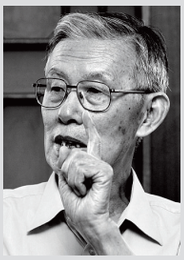
声音 VOICE

“专业分工”成为一些知识分子逃避对社会的道义责任的借口。他们只按行规操作；在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主持正义的时候，知识分子往往“缺席”。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，而是在社会良知和勇气方面有所不足。

——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在其遗著《清华精神生态史》中这样表述



我最多只能讲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学人，最多称为是一个人文学者，研究人文学术里面史学的这一部分。我距离国学大师还有十万八千里，连小学生都算不上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我很怕别人称我国学大师，我脸红啊。

——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

中国之所以实现了过去30多年（每年）9.9%的经济高增长，除了改革开放等因素之外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。然而我们面临的紧迫前景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，甚至“人口负债”时期的来临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是时候做出一些行动，为后人缓解人口上的压力了。

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，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。但是，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、内涵、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，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，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。1980年党中央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就富有远见地提出：“到30年以后，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。”六普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，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。

——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

如何兼顾社会服务与经济效益，是对传媒上市企业的严峻挑战，妥善处理好两者关系是中国媒体的改革关键之一。一种办法，每家媒体都要完成好这几项任务，这样做管得也累，做得也累，这是高难度的动作；另一种办法是，把媒体按照不同的性质和市场定位进行分类管理，各类媒体分别完成不同的任务，这样做，干起来容易，而政府管理起来会比较复杂。提高政府传媒管理的能力和水平，营造出一个真正有利于传媒大繁荣大发展的生态环境，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在新时期的课题与任务。

—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

以前农民在外面打工，找老板要不到工资，你说他们会怎么办？前两年媒体上报道农民的柑橘、西瓜卖不出去，都烂掉了，你觉得可惜不可惜？还有的农民有很多很好的“致富经”，但是缺乏资金和场所。所以我常常就想，如果你是这个村里的村干部，你能不能合理地帮助他们讨要工资，把柑橘和西瓜卖出去，帮他们解决贷款和场所等问题。你觉得可以做到吗？我觉得至少不会太难。

——清华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选调生、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硕士毕业生曾维康。他用一年多的时间，写了一篇25万字的硕士论文，题目是《农民中国：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》，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现代中国农民群像。